

津派文学 津味十足

罗海燕

津派文化大家谈

津派文学的再提出

2024年10月,天津市推动文化传承发展工作会议暨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召开,第一次从政府层面以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津派文化,要求彰显河海文化特色,擦亮红色文化底色,传承建筑文化风格、赓续工商文化基因,创新民俗文化形式、活跃演艺文化氛围、释放文博文化活力、深耕休闲文化土壤,努力打造特色鲜明、内涵深刻的津派文化品牌。这也为我们立足新时代,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重新回顾和审视津派文艺和津派文学,推动其保护传承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视野和明确指引。

天津,居内河外海之要冲,聚五方杂处之繁庶,历史肇造久远,风雅流传不绝,故文运盛、文脉广、文缘深、文蕴厚、文气足。由之孕育的津派文化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内涵丰富、类型多样。一般而言,津派文化狭义指文学、绘画、戏曲、影视等具体艺术门类的天津流派,起源于古代,发展于近代,繁盛于当代。后来内涵拓展,边界延伸,成为广义的津派文化,包括风土人情、衣食住行、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非遗”乃至审美情趣等在内,涉及长期以来在津沽大地上积淀形成的物质和精神两种文明。纵览华夏文化版图,天津作为京剧的大码头、评剧发祥地、北方曲艺之乡、中国话剧摇篮、歌唱家摇篮等,名家辈出,精品荟萃,不仅在近代文化史上占据特殊地位,也形成了具有较高辨识度的津派文化。可以说,津派文艺是津派文化的核心部分和生动体现。

其中,津派文学又称津味文学,或特指津味小说,是津派文艺、津派文化中最为广泛认可的区域流派。历史上,硕彦名儒、诗人骚客往往以壮燕游望东海、乘天风泊天津为人生极大快意之事。明代以前,史书遗阙,文献少存,天津文学多为咏物吟景、纪游酬答的散章短篇。明永乐初年,天津先后设卫筑城,开始出现正式的天津文学。这一时期的天津作家,在嘉靖之前以流寓文人为主,自嘉靖之后本土文人才开始增多。晚近以降,天津崛起为大都市,文学著作便如恒河沙数。近百年来,天津作为中国文学重镇,更是名家辈出,佳构频现,涌出一批批反映时代发展、代表时代风貌、引领时代风气的名家名作。若重新从文化与地域的视角溯源竟委,可以见出自清以来,津派文学历经孕育、发展、新变、繁盛和深化等阶段,进而形成了津味十足、文脉悠长的传承谱系。

津派文学的远源

清代是津派文学的孕育期。自明入清,天津文学呈现出繁荣态势:众多文学家族涌现,地域性文学总集增多,古典文学诸体兼备,新兴文体开始出现,戏曲文学逐渐成熟。天津作家及其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一页。最为显著者,是天津本土意识觉醒,地域作家群体出现。其中,如《津门诗钞》《津门文钞》《津门古文所见录》《津门竹枝词》《津门微献诗》等标榜“津门”的地域类文学总集大量涌现。清人梅成栋《津门诗钞弁词》曾论:“津门汇九河之秀,紫纤注海,气之所蓄,必有所钟。明代甲科辈出。本朝二百余年,斯文益盛。”在此期间,天津出现了张氏遂闲堂、查氏水西庄等文学家族和作家群体。尤其是查为仁等水西庄几代主人,广揽天下文人墨客,宴游觞咏,诗文赠答,形成了庞大的水西庄作家群体。他们以卓越的创作实绩,强大的创作队伍,使天津本土文学真正跻身并融入全国文学主脉,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天津文学独立发展和兴盛的重要标志。

近现代是津派文学的发展期。天津开埠之后,城市地位日渐提高,其反映在文学领域尤为突出者,一是天津本土作家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越来越高,二是大量的文学之士奔赴天津寻求变革和开拓。严复、梁启超、李叔同、严修、曹禺,以及官白羽、刘云若等,立足津沽、放眼全球,大力推动旧文学向新文学转型。严复曾在天津发表《论事变之亟》《原强》《原强续篇》《辟韩》《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并以信达雅之笔,最早翻译发表了《天演论》的部分章节,影响深远。当时经济的繁盛和报业的发达,还促生了影响全国的北派通俗小说。其中,官白羽被誉为“一代武侠小说的宗师”,他的《十二金钱镖》《偷拳》等小说演绎侠义精神、叙写世态人情,俞剑平、杨露禅等侠客义士形象深入人心。刘云若则用一个“情”字贯通《春风回梦记》等数十部言情小说,因其小说数量多、流传广、影响大,刘云若与张恨水齐名,被称为“南张北刘”。他的《小扬州志》等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天津市井特色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天津独特的地方风俗民情,“津味”十足,在整体上提高了津派小说的文学品位。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沽上游侠传》等小说则专写天津“混混”。对此,范伯群先生曾评论道:“刘云若的《小扬州志》等作品和戴愚庵的《沽上英雄谱》《沽上游侠传》等‘混混小说’就是天津的都市乡土文学。”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津派文学构成了后来津味小说的远源。

津派文学的近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津派文学进入新变期。天津解放后,孙犁、梁斌、方纪、王林、鲁黎、杨润身等大批来自延安和晋察冀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天津。时任晋察冀群众出版社骨干的张学新,在他的《进军天津日记》中曾兴奋写道:“天津解放了,人民翻身了!我们要同人民一起,同心协力,恢复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新天津,建设一个新中国。”这些文艺工作者往往既是延安文艺政策的执行者,又是新中国文艺的创作者,进城之后在天津传承发展延安文脉,在文坛上也“建设起一个新天津”,为天津当代文坛带来了全新格局——形成了新的文艺创作主体,创办了新的文艺传播载体,构建了新的文艺管理体制,创作了大量新作品、塑造了系列新形象,确立了文艺创作的新导向。

这一时期,天津工人文学迅速发展,无论是文学创作成就,还是工人作家队伍,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新中国成立初期,对于社会主义新文艺来说,工业题材文学尚属于新兴的追求,是对存在本质的深度探寻。

陶渊明对劳动的执着,源于他对生命本真的不懈追求。在《五柳先生传》中,他自比为“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之人,“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实则是对简朴劳动为基石的生活哲学。他深知,唯有通过劳动获得的生活,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陶渊明从不掩饰劳动的艰辛。“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农耕生活需面对自然的严酷;“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直接道出了农家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然而,正是这份艰辛,赋予了生活沉甸甸的分量与质感。未经汗水洗礼的生活,终究显得轻浮而空洞。陶渊明的选择,是对生命厚重感的追求,是对存在本质的深度探寻。

在陶渊明的世界里,劳动与诗意并不矛盾。农耕的艰辛孕育了“采菊东篱下”的悠然自得,“带月荷锄归”的不易催生了“悠然见南山”的超凡脱俗。劳动不是诗意的对立面,而是孕育诗意的沃土。真正的诗意从不回避生活的粗粝与真实,而是在粗粝中提炼出生命的精华与纯粹。

归去来兮!田园虽已荒芜,然归心似箭。陶渊明的呼唤穿越千年时空的阻隔,依然在叩击着现代人的心扉。只是我们已无处寻觅那片原始的田园牧歌,只能在钢筋水泥的森林中寻觅属于这个时代的劳动之美与生命之歌。或许答案就隐藏在陶渊明的诗句之中。劳动之美,不在于其轻松惬意,而在于其真实质朴;不在于其丰硕收获,而在于其过程之美;不在于其逃避生活之责,而在于其深入生活之髓。

陶渊明劳动的颂歌,终究是对生命的礼赞。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在培养工人作者、发展和繁荣工业题材文学方面,却较早地摸索出一套完整的成功经验,形成了天津当代文学的新传统。如孙犁曾创作了关于天津城市和工业建设的系列散文速写,后收入《津门小集》。天津文联主席阿英主编的《工厂文艺习作》一书,先后出版25种,收录了王昌定、鲍昌、阿凤等人的作品,也集中显示了这一时期天津工人文艺创作的实绩。天津工人文学创作社则是当时国内首创的由普通工人组成的业余文学创作团队,曾得到茅盾、周扬、丁玲等人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扶植,发掘培养了万国儒、董乃相等一大批闻名全国的工人作家。周骥良的《我和工人文学社》曾回忆:“工人文学社的几篇作品打响,誉满京城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评论家邵荃麟特地听了一次有关工人文学社的汇报,他很振奋也很感慨,说30年代左联在上海成立,想找一两个能写工厂生活的工人业余作者,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想组织一个工人文学社团,更是近似梦想的空谈,万没想到二十年后竟然在天津实现了。”后来的蒋子龙与肖克凡等人,则将这一传统继续发扬光大。

与此同时,无论是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还是新培养的青年工人作家,都非常熟悉并有意使用带有津味气息的方言词语,尤其是在人物塑造方面鲜明地体现出津味文化的独特性,对改革开放以来津味文学的形成发挥了奠基作用。其中,话剧《六号门》(原名《搬运工人翻身记》)以反映旧社会搬运工人的生活为主,素材来自工人、演员来自工人,甚至直接用工人的原话作为台词,公演后,广受欢迎,先后演出近百场,又改编成京剧和地方戏,并被电影工作者搬上银幕,一时间风靡全国。可以说,当时以《六号门》等为代表的津派文学,注重书写地域风俗和风情,善于使用地道的津腔津味,对后来的工业小说等都产生了直接影响,也是中国文坛上津味文学的近因。

津派文学的繁盛

改革开放以后,津派文学进入繁盛期。从冯骥才、蒋子龙、刘航鹰、林希,到赵玫、肖克凡、王松、尹学芸、武敬等,“文学津军”全面崛起,创作势头强劲,蜚声中外。津味文学自此确立,津味小说更是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范式。“津味”几乎成为天津文学最重要的标识。

其中,冯骥才从办刊、评论和创作等方面推动和发扬津味文学,短短十几年间,撰写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散文、戏剧和理论著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反响。他的小说《啊》《雕花烟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以及散文《珍珠鸟》等作品,不仅荣获各类全国奖项,还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等十余种文字,或被改编成影视等,传播到海外。蒋子龙则力举当代文坛改革文学的大纛,他的《乔厂长上任记》开启了改革文学的大潮,“乔厂长”更是成为改革者的代名词。之后,《开拓者》《赤橙黄绿青蓝紫》《燕赵悲歌》《农民帝国》等,更是以真实之笔尽情描绘时代的变革与更新、生活的广博与深刻,不断将津派文学推向新的高度。

此外,刘航鹰先写话剧,继而创作小说,后又投入影视编导。她的《明姑娘》《金鹿儿》《倾斜的阁楼》《乔迁》等,勾勒世相,描摹人生,我比不了小青年。但我是老天津卫了,祖辈几代生活在天津,对旧天津的生活比较熟悉,对天津的旧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觉得一心一意去写天津味比较适合我。”林希先后创作了《北洋遗怨》《相士无非子》《高买》等,注重揭示天津人深层次的心态和天津文化深层次的内涵,刻画豪爽、侠义、热情、朴实、幽默、聪明的天津人形象,为世人展示了天津卫百余年的民俗画卷。

南北朝时期,南朝刘宋的开国皇帝宋武帝刘裕是个苦出身,发达之前曾吃过许多苦,因此,在其当上皇帝后,仍然十分注重节俭,平时穿着朴素,脚踩连齿木屐、身着普通衣帽;住处用的是土屏风、布灯笼、麻绳拂,生活起居非常简陋。为了警戒后人,他在宫中悬挂了自己少时使用过的农具、补缀多层的破棉袄,展示给子孙以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曾经的苦难,要厉行节俭、艰苦奋斗。

刘裕驾崩后,皇太子刘义符即位,因其不亲政事,游逸无度,被辅政大臣司空徐羨之、中书令傅亮、领军将军谢晦及护军将军檀道济等人联手发动政变废黜并杀害,刘裕第三子刘义隆被迎回京中立为皇帝。

刘义隆即位后,在宫中看到了自己父亲早年用过的那些农具,他身边侍臣中有人进言说:“当年大舜亲自在历山耕田种地,大禹也曾亲自治理水患。陛下不看到这些遗物,怎么能够知道先帝崇高的仁德和耕种的艰难呢!”刘义隆因此深感惭愧,决心像父亲一样做一个不忘本的节俭皇帝。

刘骏是南朝刘宋的第五位皇帝,是武帝刘裕的孙子、文帝刘义隆的第三子。刘义隆被其嫡长子刘劭杀死后,刘骏起兵攻杀刘劭,从刘劭手中夺得帝位。刘骏即位后,也曾看到过宫中悬挂着的那些刘裕少时使用过的农具、补缀多层的破棉袄,侍臣中也有人盛赞宋武帝节俭朴素的品德,刘骏却讥讽说:“庄稼汉得到这种享受已经是过分了。”

刘义隆即位后,继续实行刘

自孙犁、梁斌、方纪等,发展到冯骥才、蒋子龙、刘航鹰等,以津味小说为中心的津派文学,有着代表性作家、经典性作品,大致形成了运用天津地方语汇、刻塑沽上特色人物、展示天津市井风情的整体性风格,并对年轻一辈作家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无论是冯骥才写奇人俗事、林希写能人世事,还是冯育楠写真人轶事、肖克凡写凡人琐事,他们因为精熟于生活、挚爱于本土,所以都能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神有态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文化状态。尤其是,他们深入生活、紧贴时代的人文精神,写作勤奋、态度严谨的专业精神,以及真诚为本、自成风格的独创精神,得以继承和发扬,也引发了对新津味文学和新津派文学的深入探索。

津派文学的新境界

进入新时代,津派文学转向深化期。天津作家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持续“出精品、出人才”,不断开拓津派文学的新境界。

一是作品数量和质量实现“双提升”。据不完全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仅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签约合同制作家就在全国报纸、期刊发表出版长、中、短篇小说400余部(篇),报告文学100多部(篇),散文、诗歌、随笔3000余篇,评论、论文近400部(篇),话剧、影视剧本300多部(集)。仅2021年,就有13人次荣获全国各类文学奖项。其中,冯骥才《多瑙河峡谷》获《当代》杂志“年度中短篇小说总冠军”;尹学芸《鬼指根》入选《收获》中篇小说榜;张楚《过香河》获第十九届全国中篇小说百花奖;王松《暖夏》入选“第六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此外,冯骥才的《俗世奇人》和尹学芸的《李海叔叔》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和中篇小说奖,王松的《红骆驼》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天津作家的不少作品还被翻译成介绍到海外,扩大了天津文学的国际影响。

二是“文学津军”队伍更加壮大。截至目前,天津市作协会员数量超过1700名,其中中国作协会员200余名。近年来,为打造建设一流队伍阵地,天津坚持“广泛吸收、挖掘潜力、把握质量、注重培养”的原则,先后实施了培根铸魂、改革强文、高原高峰、文学惠民、人才兴文、融合发展等重大工程,成效明显。如蒋子龙荣获“改革先锋”称号,王松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奖”之“优秀作家贡献奖”,冯骥才、张楚、朵渔获“新世纪文学二十年20家/部”奖,充分展示了“文学津军”的雄厚实力。

明代易学家家乔中和解“剥卦”时尝言“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这也道出了津派文学谱系传承不绝的根由。赵玫曾说:“任何的创造性都来自于对自身传统的扬弃,并由此发现并创造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形式。”尹学芸则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有力证明:“生活中处处都是文学素材。”新时代新征程,天津作家将更加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深挖津派文化资源,不断推出时代特色鲜明、文化风格独特、地域特色浓郁的精品力作,继续以如椽巨笔书写津派文学的壮丽篇章。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社会科学院基地研究员、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与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陶渊明的劳动颂歌

张宏宇

陶渊明“归去来兮”,世人皆以为他归隐田园,不过是寻一处清静,以避世乱。殊不知,他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背后,实则是对土地深沉而执着的爱恋,是对泥土虔诚的俯首。

世人只见其悠然自得,却忽略了他背后的辛勤耕耘。陶渊明在《归园田居》中言辞恳切:“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黎明即起,披星戴月而归,劳作之繁重可以想见。他笔下的田园,绝非文人墨客浅尝辄止的逸趣所在,而是汗水浸润的真实天地。“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自嘲,不仅是对农耕艰辛的坦诚流露,更是对劳动果实饱含深情的记录。草盛豆稀,何尝不是劳动艰辛与收获不定的真实写照?

陶渊明之所以伟大,恰在于他勇于直面农耕生活的全貌——既有“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田园诗意,亦有“力耕不吾欺”的坚韧不拔。他将文人的才情与农人的辛勤劳作融为一体,在泥土的芬芳中探寻生命的真谛。当同侪在宴饮中吟风咏月时,他却俯身向下,与大地进行着一场平等的对话。这对话,没有丝毫的俯视与玩味,唯有平等地交流与谦卑地学习。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中,劳动往往被轻视。在士大夫眼中,农耕始终是“小人”的行径,而君子应“谋道不谋食”。陶渊明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谋道,亦谋食,且将谋食视为谋道之基。他的归隐,不是逃避现实的懦弱之举,而是选择了一种更为艰辛的生活方式——以双手自给自足,在劳动中体悟生命的真谛。

在《归去来兮辞》中,陶渊明写道:“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趁着春天美好的时光,独自外出;兴致所至,便放下手杖,拿起农具除草培土。这种劳动是自主的,与其内心的节奏相契合,因此虽苦犹乐。

态度不同 结局不同

唐宝民

裕的治国方略,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诸逋债”,又实行劝学、兴农、招贤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经济文化日趋繁荣,由是三十年间“方内晏安,氓庶蕃息,奉上供饷,止于岁赋,晨出暮归,自事而已”“人有所息,无苛得,家人入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末世之极盛也”,开创了“元嘉之治”的盛世局面。刘义隆也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他在位的三十年,也是南朝刘宋最强盛的时期。

而刘骏呢?刘骏是一个荒淫腐败的昏君,在位期间,不惜骨肉相残,刘氏宗室惨遭此大劫,刘宋势力更加削弱。尤其在其统治后期,刘骏贪图享乐、荒淫腐败、不理朝事,致使朝纲混乱、官风日败。他奢侈无度、耽于享乐,大兴土木、扩建官室,墙上和柱子上都用锦绣装饰,几乎把国库内所有的东西都拿空了。刘宋王朝在刘骏的折腾下走向衰落,终于在公元479年,被权臣萧道成的南齐所取代,南朝刘宋由此灭亡,此时,距刘骏死去只有15年。

面对祖辈留下用来以警示后代的农具、衣物等,文帝刘义隆的态度是“深感惭愧”并决心效仿父亲厉行节俭,而孝武帝刘骏不仅是一副不屑的样子,还对爷爷出言讥讽。对同一事件的不同态度,反映出二人不同的人格,也预示了二人日后不同的结局:一个成为一代英主而名垂千古,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国家;另一个却以昏君的名声遗臭万年,把一个强盛的国家折腾得奄奄一息。不同的态度导致不同的结局,这就是历史轨迹呈现给我们的教训。